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

巴金

画传

周立民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巴金画传

周立民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金画传/周立民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220-08104-0

I. ①巴… II. ①周… III. ①巴金 (1904~2005) —
传记—画册 IV. ①K825. 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8046 号



BAJIN HUAZHUAN

巴金画传

周立民 著

图片提供

李小林 周立民

策 划

罗韵希 王华光

责任编辑

王华光 蒋咏宁

封面设计

魏晓舸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cinfo.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70mm×240mm

13.75

3

110 千

180 幅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8104-0

35.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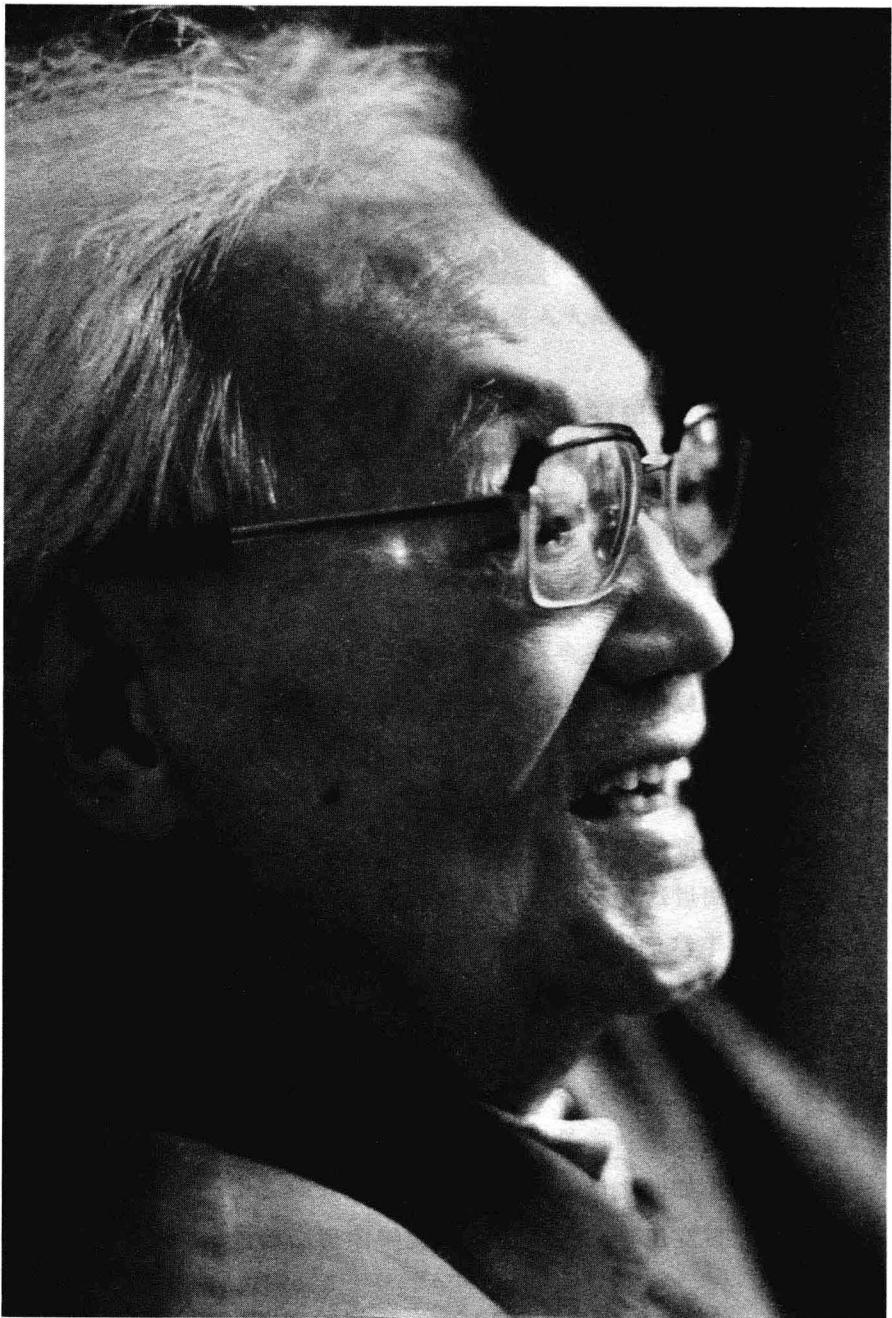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小 引

我的架上已经有很多种风格各异的巴金传记了，要想以画传的形式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成一个世纪老人生命历程的叙述，这就决定了这本传记的写作起点：它不会是一本面面俱到的传记，也不想成为蜻蜓点水式的人物介绍，它应当疏密有致，有所侧重也有所放弃。但面对巴金这位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为了更接近这个目标，面对着传主卷帙浩繁的著译、饱经风云的人生和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时，我首先得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理解，并使它们能够构成本书写作的一个基本的线索。我选择了两个方面：一是巴金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又怎样有了这样的创作，我要勾勒出他的成长和思想变化的基本轨迹，同时也要显示出他的创作与生活、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二是巴金与五四新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巴金一再说他的写作如同生活，也不断强调他是五四之子。我觉得这两个线索不但能够贯穿巴金的一生，而且能够体现出巴金的创作特色和精神气质。

在20世纪30年代，巴金对新文化运动带给他的精神震动和洗礼还记忆犹新：“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



巴金 (1904.11.25~2005.10.17) 徐福生摄

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信仰与活动——回忆录之一》，《水星》第2卷第2期）其时，他还是成都一个大家庭中的少爷，青春的热血与激荡的社会风云融合到一起，不断渴望着新鲜的、有活力的、有力量的因素出现在沉闷、压抑的生活中，五四新思潮冲开了堤岸，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巴金自称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给了他新生。是五四让巴金有了信仰有了梦想，也找到了现实前进的方向。从此以后，无论在人生和写作中，巴金都始终高呼着五四启蒙精神，从《家》到《随想录》，这种姿态历经艰难，但还是磕磕绊绊地坚持下来了。所以到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時候，他仍然充满深情地说：“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禁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巴金全集》[以下均简称《全集》]第16卷第66页）尽管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巴金对五四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一生与五四的纠结却是非常明显，难怪2005年当他远去的时候，许多人都在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是五四的时代，可以说巴金是那个时代精神最执著的践行者。

从巴金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视角来考察他的人生和创作，我把它分为四个时期：洗礼、践行、迷失和复归。第一个时期是巴金的人生成长期，巴金接受了新文化精神的洗礼，确立了人生起点和信仰。第二个时期是巴金的人生创造期，在这个时期，从小说创作、编辑生涯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道义上，巴金都在一一承传和践行着五四精神。而“迷失”，主要是指自我的迷失，这也是巴金在《随想录》中多次反省的地方。在这个时期，他个人的价值判断与周遭世界不断发

巴金

画
传

1904~2005

004

生冲突同时也不断在退缩，直到彻底迷失了自我，沦为一个“奴在心者”，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体灵魂挣扎的历史。复归则不是简单地回到五四的原点上，而是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对自己一生的清醒反思，同时也是对五四价值更坚定的捍卫。以这样的思路来叙述巴金的一生，虽然并不算什么独特发现，但我想至少它与已有的传记不怎么重复，这样至少也可以给我一点信心——与这位老人漫长的一生对话的信心。

目 录



小引 / 001

第一章 洗礼 (1904~1925) / 001

1. 新与旧 / 002
2. 诗文传家 / 009
3. 梦境中的事业 / 014
4. 丢掉可怕的阴影 / 020
5. 窥见了理想的美丽 / 025

第二章 践行 (1925~1952) / 033

1. 理论与实际 / 034
2. 文学与信仰 / 048
3. 困境与突围 / 060
4. 抗战与改革 / 075
5. 理想与庸常 / 086
6. 等待与希望 / 093

001

目

录

第三章 迷失 (1952~1976) / 109

1. 从书斋走向战场 / 110
2. 从早春走向严冬 / 118
3. 从人间走向地狱 / 130
4. 从绝望走向“安心” / 144

巴金

画
传

(1904~2005)

002

第四章 复归 (1976~2005) / 151

1. “我这一生的收支总账” / 152

2.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 / 165

3.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

仍在追求” / 175

尾 声 激流涌人大海 / 189

附录一 巴金生平大事记 / 200

附录二 巴金主要著作目录 / 205

主要参考书目 / 209

后 记 / 210



(1904~2005)

巴金
画传

第一章 BAJIN HUAZHUAN

洗礼 (1904~1925)

1. 新与旧
2. 诗文传家
3. 梦境中的事业
4. 丢掉可怕的阴影
5. 窥见了理想的美丽

巴金

画
传

(1904~2005)

002



1 新与旧

稍有现代文学常识的人恐怕都知道巴金的著名小说《家》，而且也多少会了解它是以作者的家族人物为原型写成的。作品的巨大影响力，生活与创作的相互融合、裁剪已经使生养巴金的李家与小说中的“高家”经常混同到一起，甚至20世纪50年代还有人问巴金他的嫂子是不是翠环、侄女是不是翠环生的^[1]。也不能完全责怪读者，难道巴金本人就没有把作品世界当做现实生活的时候吗？巴金曾说写《家》时，“最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就是那些我所熟悉的面庞，然后又接连地出现了许多我所不能够忘记的事情，还有那些我在那里消磨了我的童年的地方”^[2]。现实中的李家又是怎样，又有哪些巴金不能忘记的面庞，这个“家”在巴金的精神成长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在小说《家》及其续篇《春》、《秋》中有几个著名人物常常被人自然而然地与现实中的李家人物对号入座，比如高老太爷与巴金的祖父，克明、克安与巴金的二叔、三叔，觉新与巴金的大哥，瑞珏与巴金的大嫂，觉民与巴金的三哥，而觉慧自然就落在巴金的头上了。对有些人物这样画上等号似乎并没有错，但经过艺术加工后的素材毕



巴金记忆中的李家公馆，正如小说《家》中所写，门口有对石狮子、石缸，门墙上挂着木对联，上书“国恩家庆，人寿年丰”。这是他离家后改为“怡庐”的门面（1926年3月8日大哥所寄）。



油画《巴金故居》（作者：贺德华），巴金本人看过这幅画，但不记得有这样的银杏树，认为此处可能是李家旧日的马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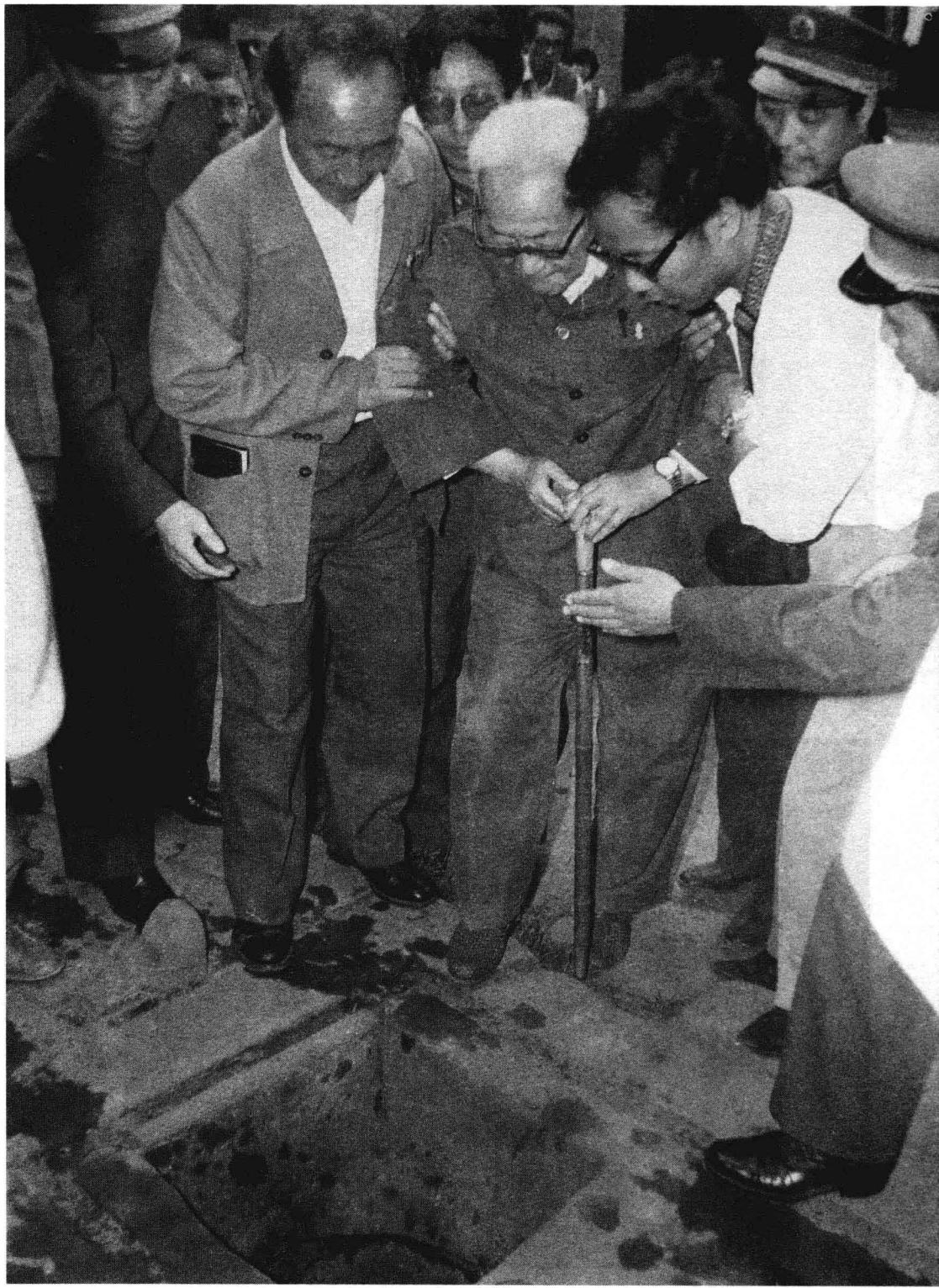
竟不能等同于生活现实。不过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不妨做个辨识。比如，高老太爷与觉新比较接近现实中巴金的祖父和大哥的角色，但大嫂虽然确曾避出家外生产却不曾难产死去。巴金和三哥如同觉慧一样离家去上海求学，但据巴金在后来解释：觉慧的性格也许跟他自己差不多，而三哥以前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并不如觉民那么谨慎，“觉慧也做我做过的事情”：都在成都外专读书，结交新朋友，编辑刊物，创办阅报处等。但不同的是巴金和三哥是公开离开家的，而觉慧是私自离开家。同时巴金也申明，在他的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鸣凤^[3]。还有，小说《春》中觉民的一些活动则是取自巴金离开老家前在成都的一些活动。比如五一节散发传单，在周报社的活动；而演出《夜未央》则是巴金的一群朋友所为^[4]。

为“激流三部曲”做索隐一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我所关注的是巴金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复杂，因为对于“家庭的环境”巴金有过相当数量的文字描述，但斟酌一下

又不能不谨慎对待这些文字：目前我们所见的巴金第一批谈论自己家庭状况的文字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主要有两部：1934年11月出版的《巴金自传》，1936年改名《忆》增补篇目重新出版，还有1937年出版的《短简》中的篇章，较为详细地回忆了从出生到从事创作之前的生活。但早就有学者指出：此时的巴金是个经过五四精神洗礼并且有了自己信仰的人，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这些回忆散文中，“家”都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它代表着黑暗而专制的王国——而非巴金当年生活的真实环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对“家”的回忆更为强调的是新与旧的冲突，强调自己与“下人”之间的平等交往。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环境下，巴金写作《谈自己的创作》的时候，他所要执行的只能是对这个“封建家庭”的批判，而不能过多地同情。到新时期，巴金比较能客观地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家族的事情了，比如《怀念二叔》中所谈的，但这个时候巴金的精力不济，留下的文字不多，所以，我们对于他家族的印象更多是建立在巴金以前的叙述上，不是说巴金所叙述的不是事实，而是在这



1907年的家庭合影，右三是巴金的母亲，左三外婆怀里抱着的是巴金，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留下的第一幅影像。



成都正通顺街上的双眼井长久留在巴金的记忆中，这是 1987 年 10 月 8 日上午，巴金来到这井前，他仿佛又走在了童年的街上。

样的叙述角度中另外的事实可能被遮蔽掉了。

比如说这个家族的最高长辈李镛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巴金曾这样叙述：“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蒐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却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5]这段话是需要做很多注释的。巴金的祖父李镛（？~1920）的经历颇为典型地体现了晚清到民国转换中一批士大夫的经历：“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封建大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一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6]在这些人身上，有着非常典型的两面性，一面是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有习惯于传统方式的某种保守性，另外一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也会在现实层面上较早地实现转变，或者毋宁说他们比普通阶层的人更有条件获得某种有利的现实权利和机会。

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旧时代”的人，他们会按照旧的伦理道德生活、看待事物，但这并非就意味着要强调或夸张他们顽固、堕落或腐朽的一面，巴金也一再强调他攻击的是制度而不是人，那是因为在这种家族制度下，这些人所做的无非都是这个制度下所通行的一切，而我们必须要看到他们处在一个剧变的时代，虽然是在思想意识较为保守的内陆成都，可他们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他们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调整以维护自己处于社会上层的位置。比如李镛将两个儿子送到日本留学，而且学习的是法律，这看起来是非常“前卫”的事情，而学习法律则属于颇为新潮之举，但深入分析又很难说他们思想前卫，这不过是士大夫家庭中走仕途的另一条路径而已。《四川近代史稿》就曾指出，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对官僚制度进行了改革，加之西学传入，学习法律和政治风行，四川留日学生在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学习法政科的也有相当数量。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



立宪之后，法学堂在四川也应运而生，并开始招生。到1910年底，省城公立的法学堂有十四五家之多，每个学堂多则六七百人，少者也不下百人。“法政学堂的大量涌现，主要是迎合了当时人们急于做官的心理。”^[7]事实上，巴金的三叔回国后就曾当过南充知县。可见留日和学习法律都很难说是思想解放的前瞻之举。但李镛也算不上封建卫道士的代表，他只是一个保守的时代顺应者。对待巴金兄弟的教育同样可以看出：“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8]当时士绅阶层对于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还是颇多微词甚至激烈反对并不奇怪。虽然五四新思想的火种已经在四川燃烧，但到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李镛的保守也是一种“正常”反映，而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写的很多年轻一代与老一辈的冲突并不都是刻意的夸张。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是1918年秋天，送巴金去学外语也谈不上开通，“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摇。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9]。同样这些选择都是现实的需要，而非表明一种文化立场。所以，巴金的大哥留学德国学习化学的梦被斩断，是由于需要长房长孙承担起复兴家业的重任，也是家里的长辈对这样的新学未必大有兴趣。至于巴金的姐姐生病，母亲请教会的医生来看病，还在家中做了西餐并从此与教会的人还有了来往的事情^[10]，同样是现实的需要。李家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面前的表现也说明了，他们既不是急先锋也不是顽固派。当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风潮涌到他们面前的时候，李家的态度也比较平静，是顺利接受，而不是坚决反对。李家就是时代大潮中的一分子，它不是在风头浪尖上，也不是阻挡风浪的礁石。

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遭遇近代民族危机的中国，在国门打开之后，已经无法让古老的文化形态按照原来的方式运转下去了，求变的声音和行动毕竟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新文化的传播是现